

● 李学曾 著

历史的思考 和思考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108183 / 008

历史的思考和思考的历史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问题

李学曾 著



F048/13

191081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北京

责任编辑: 李若愚

责任校对: 王 新

版式设计: 冯爱丽

封面设计: 谭国民

历史的思考和思考的历史

Lishi De Sikao He Sikao De Lishi

李学曾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太 阳 宫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13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004-0646-0 / F · 136 定价: 4.2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近些年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部分成果。它论述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及理论框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全面性和我国的工业化战略；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我国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及其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农轻重比例和结构的变化规律，战略对策的成败和改进方向等。

序

语云：“文如其人”。李学曾同志这本选集，我阅读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有实事求是之志，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正如其人。诚属难能而可贵。

李学曾同志于 1959 年留苏归来，即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理论研究。他理论造诣较深，又努力于理论结合实际，专心致志作学问。这本书，是从他二三十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经过精选，辑录而成的。全书分为三篇，每篇各具特色，各有其独到之处。如：

本书开篇的第一章，是对我国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述评。但它不是对不同观点的简单罗列，而是经过高度的概括和评论来表述自己对再生产理论的若干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建议。他说“对于理论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我们的迫切任务是揭示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特有的规律性，以便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加以运用，并且在这种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他指出，过去人们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多从产品再生产角度进行，这是必要的，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对所有制关系再生产的研究则很不够；对于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问题也未纳入社会再

生产理论中进行研究。他认为所有制结构及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值得深入研究；现有经济总规模对社会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同劳动力资源总供应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力的城乡分布和人口转移对社会再生产总循环的影响等，都需要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作者一向注意理论结合实际。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注意到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忽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都在重视结合实际，逐渐改变过去那种学院式的研究。这是学风上的一大转变。然而有些人竟乃置基础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于不顾，片面地强调引进西方市场经济，……不容否认，外国的经验只要是对我们有用的都要学习。可是，如果不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是不可能取得最佳效应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曾同志强调理论建设，也可以说是“反潮流”。

作者还在几篇文章中，对几个广泛流传而又并不确切的观点，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举两个例：

关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作者概括叙述马克思区分两种类型扩大再生产的四个标志之后指出，马克思没有把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劳动素质提高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单独列出来。这是因为资本家已经把劳动因素包括在资本之内，而且劳动力再生产是劳动者个人私事，资本家不必过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属于一个主人，所以，我们在区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时，就不能忽视劳动力因素的数量增加和素质提高。接着他对两种扩大再生产给出定义“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数量而实现的扩大再

生产，而这些要素的效率和数量没有变化；所谓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定义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同时，作者也结合我国国民收入动态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作者认为从经济学的含义，以及列宁提出这一原理来看，所谓“优先增长”是指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增长更快。而我国有些人把优先理解为“顺序在先”或“优待”，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中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各方大军让路”等等，并不符合列宁提出这个原理的本意。至于有的人把优先增长同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条件的公式—— $I(v+m) > IIc$ 混为一谈，究其原因，不仅未弄通这个公式的含义，而且也未弄通优先增长的本意。

进入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曾同志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发展战略和发展经济学方面来。我很欣赏他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倡议，以及招收并培养发展战略专业研究生的举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与发展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发展经济学就是以发展战略为基本内容的。

作者在建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中颇有些独到之处。举例来说：

他认为研究发展战略不应忽视我国历史遗产和传统对发展的作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观点，较之那些既不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在，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肆意否定历史传统，盲目迷信和追求西方文明者，奚啻霄壤之别。

把历史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同发展的最终目的区别开来。作者认为发展是个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同，应有不同的发展战略目标。唯有通过发

展，才能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这个最终目的。基于此，作者不同意只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单一指标作为发展战略目标，而是应该代之以“综合指标体系”，同时列举了这个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的几个方面。

最后，作者把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提出来。这也是颇有见地的。

这本书殿后的一章是讨论我国新时期工业化战略对策的几个问题。此文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系统而详尽地讨论了我国现代化的战略对策问题。我相信他的若干观点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从学曾同志到经济研究所以来，我们一直共同从事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也几次合作研究写作。我们两人堪称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看到他的研究结晶行将问世，不禁由衷的喜悦。故特为之序。

杨坚白

1987.9.18.

一年多以前，我为学曾同志亲自编选的文集写了个《序》。不料今年四月，学曾同志心脏病发作，不幸于4月9日突然逝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本书问世。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有许多工作还等待他去做。可是，他却与世长辞了，再也不能与我们共同研究，合作共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谨志于此，表示我沉痛的悼念。

杨坚白

1989年6月3日补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原理 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研究	
第一题 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进展	(6)
第二题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研究	(30)
第三题 我国国民收入生产动态的若干分析和宏观管理的经验教训	(58)
第四题 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浅探	(79)
第二篇 我国工、农业比例和结构的调查与研究	
第一题 我国 1949 年至 1962 年工农业关系的调查与研究	(88)
第二题 论我国农轻重三者关系的历史经验	(115)
第三题 论农、轻、重三者的本质联系	(153)
第三篇 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探索	
第一题 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178)
第二题 从拉尼斯等人对当代发展基本问题的回答所想到的	(186)
第三题 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196)
第四题 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全面性	(216)
第五题 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的宏观结构和发展战略问题	(241)
第六题 论新时期我国工业化的战略对策	(260)

前 言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作者从本世纪 60 年代至今从事经济理论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汇编。它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问题的文章；二是研究我国工农业比例和结构问题的文章；三是 80 年代以来着手研究发展经济学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作者又做了若干必要的技术性的加工。

与此相适应，本书的框架设计也列了三篇。

第一篇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研究，包含四篇论文。第一题总结和概述了新中国建立后 30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应当着重探索的课题；第二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理论系统的较全面的论述；而第三题则是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分析了我国国民收入的生产动态和宏观管理上的经验教训；最后一题是笔者 60 年代专门讨论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论文，其中某些看法至今还有一定意义。

第二篇我国工农业比例和结构的调查与研究，包括三篇论文。第一题是作者在参加 1962—1963 年经济工作十年总结（1952—1962 年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对全国的和某些省的工农业关系进行调查之后所写的研究报告。今天看来，文中的某些分析、论断和建议，仍有一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

意义。第二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试图总结我国在处理农轻重关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此文的英文稿在西方发表，苏联的刊物也译为俄文发表。读者通过这第一、二题的内容可看到作者有关论点的来龙去脉和思想发展。第三题是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实现原理，分析农、轻、重三者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以两大类产品彼此交往的本质联系，并提出了农轻重三者相互协调的具有三个层次的标志。

第三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探索，包括六篇文章。第一题以读书笔记的形式简述了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观点和发展战略主张的发展变化，使读者对当代西方的这个新学科有个概略的了解；第二题收入了作者1980年夏季参与组织和主持由拉尼斯、阿德尔曼、斯蒂格里茨等十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授课的讲习班之后所写的概括性的文字，其中还提出了我国应当研究的发展战略问题；第三题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即在马克思的发展论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必要性和理论框架的初步设想；第四题讨论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选择的全面性问题，它是1983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而写的；第五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消费的宏观结构和战略对策的若干设想；第六题试图从新的发展战略的角度探讨我国工业化的对策问题。

这本书如果能够基本上反映出作者对我国有关的历史经验的某些理论思考，和这些思考本身演进的历史足迹，那么本书定名为《历史的思考和思考的历史》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还应当说明，正由于本书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理论探讨性，所以书中的某些观点可以至今仍是正确的，而另一些观点不免带有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书中所引用的

统计资料和事实资料，虽然都是出自统计书文和报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这些资料中含有某些“水分”。所以，如要引用资料，请以国家统计局部门所掌握者为准。

最后，向为本书作序的杨坚白同志以及为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殷衷同志和编辑加工辛苦劳作的李若愚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学曾 1987.8.2.

第一篇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原理
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研究

第一题

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进展

在我国，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的学习和研究，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和经济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在进一步研究和实际运用这些原理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对再生产原理的研究讨论大体经历过四个阶段，在第二、四阶段掀起过两次争鸣的热潮。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全国人民政权建立伊始，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迅速取得了进展，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和综合平衡理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原理，就成为当时经济界和理论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特别是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斯大林对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的六条概括及其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论断，展开了较广泛的学习和宣传，对党和政府当时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进行了论证。认为优先发展重

工业符合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同时，对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条件下，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基建规模同投资力量之间，发展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做了论证。这对“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积极作用。尤其在“一五”计划执行末期，人们发觉优先发展重工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从而提出适当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的观点；对1953年和1956年发展速度过快而造成国民经济运转的紧张状态，提出了适当放慢发展速度的观点。1957年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证明了上述那些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那时人们对斯大林的某些片面观点，如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归结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进一步归结为优先发展钢铁、煤炭和机床的观点；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观点；积累是扩大再生产唯一源泉的观点等，不但未能明确尖锐地指出，而且在实践上还出现了某些更加片面的作法。

第二阶段（1958—1965年）。在“反右倾”和“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指导下，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不切合实际，并进一步诱发了左倾的发作。人们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认定“快是总路线的核心和灵魂”，要求用“最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速度与比例的相互制约、人财物和产供销的平衡等客观必守的条件都置于不顾。结果，“大跃进”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面紧张，最后只好退下来，进行全面调整。人们面对大上大下的折腾带来的重大损失，开始反省与总结，寻找失误的理论根源，特别是在再生产理论方面，更是

人们注意的中心。这就掀起了关于社会再生产原理的百家争鸣的第一次热潮。当时人们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上盲目增加基建投资，铺新摊子，忽视原有企业更新改造即所谓简单再生产的状况，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有以增资、增人和增设备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忽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的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及衡量它们之间比例是否协调的标志问题；还讨论了消费积累比例及其数量界限等问题。

这次讨论，无论是从深度来说，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的，而且具有从理论上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特色。

第三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一场浩劫。当时全国都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中，不可能进行任何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不但60年代初几年关于社会再生产原理的认真研究未能继续，反而使三年“大跃进”时期泛滥成灾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思想更加膨胀。在“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的谬论冲击下，社会再生产客观规律的研究完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第四阶段（1977—1984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的工作，并号召大家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通过对经验教训的分析